



悬泉置汉简所见中西交通史实考论*

张俊民

摘要:悬泉置是已知丝绸之路上唯一经过考古发掘并出土大量文字资料的驿站遗址,其日常运作与管理反映了汉代中西交通的盛况,是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悬泉置汉简以其出土于关键节点的特性和档案文书的细节性,深化了学界对汉代中西交通史的认识。其价值体现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首先,它精确锚定了悬泉置作为丝绸之路东段核心枢纽的地理坐标,并清晰勾勒出以之为中心的层级化邮驿网络,揭示了汉王朝交通动脉的制度根基。其次,它生动再现了汇聚于此的多元人群及其互动场景,展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图景与治理逻辑。最后,其自身运作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西交通日常实践与制度保障的微观窗口,同时也体现了边郡为中西交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悬泉置汉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民族交往;邮驿制度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1-0108-10

悬泉置汉简是汉代悬泉置遗址日常管理与运作所使用的档案文书得以保留下来的部分,目前的数量是1.8万枚。《悬泉汉简(壹一伍)》已经由中西书局于2019—2025年陆续公开出版,约占预计八卷本的二分之一多,发表简牍数量约11000枚^①。悬泉置是汉代邮驿系统中级别最高的组织机构,主要负责过往人员的食宿供应与政令邮书的传递,类似的机构在敦煌郡有9处,酒泉郡有11处。悬泉置作为汉朝驿道重要节点的同时,又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兼具沟通丝绸之路、维持中外关系与连接中西交通的重要功能。认真梳理悬泉置汉简相关资料,进一步认识其日常运作详情,是我们利用史书研究汉代中西交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内容。限于篇幅,我们仅就目前较为明晰的几点认识做简单总结。

一、地理枢纽与驿路网络:悬泉置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

通过对遗址出土的悬泉置汉简的研究可知,悬泉置是当时敦煌郡在官方大路上设置的级别最高的驿站机构。作为汉王朝内部日常行政管理而设立的邮驿系统,悬泉置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成为丝绸之路、中西交通、中外关系的重要节点。

悬泉置是汉代邮驿系统的一个驿站,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最东部,接近瓜州县界^②。考古发掘后的遗址主体是一个50米见方的坞堡,西南角突出一个30米见方的马厰区。坞堡东侧开一门。遗址内遗存以西汉为主,新朝、东汉、晋代均有沿用,唐代在其附近设有悬泉驿。悬泉置遗址除本体之外,还有东侧山上的烽火台,可

收稿日期:2025-05-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198)。

作者简介:张俊民,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甘肃兰州 730050),中国历史研究院杨富学工作室成员,主要从事西北简牍整理与研究。

能就是悬泉置汉简中出现的“山上亭”，还有保障悬泉置日常生活用水的悬泉水。悬泉水的左侧沟边应该是汉简中“临泉亭”所在。临泉亭以东是汉代效谷县通往广至县的古道，也就是丝绸之路、中西交通的大路。沿途除了不计其数的石头堆路标外，还有D114、A86、A87等驿站遗址^③。这些驿站遗址应该是汉简中出现的石靡亭、万年骑置等。

悬泉置遗址位于汉代效谷县东部，是效谷县境内驿路上两个驿站中的东边一个，西边是遮要置。遮要置西经敦煌乐望亭入敦煌县以及敦煌郡所在的敦煌置。悬泉置以东是敦煌郡广至县的鱼离置、广至置、冥安置与渊泉置。而与其他置相比，悬泉置距离县治最远，其东与广至县城之间有一个鱼离置，其西与敦煌、效谷县城之间也间隔一个遮要置。悬泉置远离西汉县治所在，其与人口密集居住区相对较远，其日常保障供给因而更加困难，更凸显其所在位置对交通的重要性。即便现在，此地仍是交通必经之地，而周围数十公里之内依然没有居民点。

效谷县驿站级别最高的是悬泉、遮要二置，还有4个级别低一级的骑置，主要负责紧急公文传递。此外还有悬泉置西侧的平望骑置、遮要置西侧的甘井骑置。每个骑置配备有3匹马，1名小吏和3名具体负责养马、传递邮书的驿骑。骑置大体位于置与置的中间点。悬泉置距离西侧平望骑置50汉里，距离万年骑置40汉里，万年骑置位于悬泉置与鱼离置的中间点^④。

比骑置低一级的邮驿机构是亭，它也是驿路上最小的基础单元。悬泉置与平望骑置之间是无穷亭，大致在悬泉置与平望骑置的中间位置。亭中有亭长1人，亭卒3人，负责驿路安全，并为过往人员提供必要的服务。

交通干线之外，还有支线。在效谷县西侧的安民亭有一条支线，可以到敦煌郡北部长城防御线上的中部都尉府。敦煌东行的普通路线大站是遮要置、悬泉置、鱼离置、广至置、冥安置，渊泉置是敦煌郡最东边的一大站。渊泉置距离酒泉郡最西边的驿站乾齐是58汉里。

从敦煌发给效谷县的文书，也可以直接由敦煌的乐望亭传过来，而从广至县发给效谷县的邮书，一般是由安民亭经过西门亭传给县廷

的。临泉亭经西门亭传递到效谷县廷的驿路长124汉里，石靡亭到安民亭的距离是140汉里。悬泉置到冥安置的距离是210汉里，到金城允吾的距离是2820汉里，到天水平襄的距离是2830汉里，到长安的距离是4080汉里。

晋代悬泉置附近的状况，不是十分明确，一般将遗址西南角最高的烽火台作为晋代的主要遗存，代表遗物有晋代的纸张以及“康哉之歌”竹简^⑤。

唐代的文书，对我们完整认识悬泉置提供了帮助，汉简上书写的汉字是“县泉置”，对照敦煌文书我们才知道“县泉”应读如“悬泉”，即泉水从崖壁坠落，悬空而出，地图上的“掉掉（吊吊）水”称谓则更贴近真实情况。而附近的甜水井已经距离悬泉置的命名时代很久远了。唐代称“掉掉水”为“悬泉水”，一度在水东15里设悬泉驿^⑥。

一般认为唐代的常乐县城，在今瓜州破城子，也就是汉代的广至县，其西南的鱼泉驿大致相当于汉代的鱼离置，悬泉驿是在山南空谷驿废弃之后出现的，应该在泉水东15里，是不是与悬泉置遗址中的晋代状况相类似不得而知，但唐代的无穷驿无疑不是汉代的无穷亭位置。汉代的无穷亭位于悬泉置与平望骑置之间25汉里左右，是悬泉置西侧最近的亭。由于汉、唐的时代差异，名称一致而位置未必在一处。

将悬泉置及其周边形成的交通网放置在汉代邮驿系统之中来看，它只是敦煌郡效谷县的一段路线而已。其设置可在汉代的《行书律》《传食律》中找到依据。简牍文书所见汉代邮驿的设置状况如下：

十里置一邮，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界，廿里一邮。^{[1]198}

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地险陝（狭）不可置邮者，得进退就便处。^{[1]199}

具体到西北地区的机构设置，恰印证“得进退就便处”的描述，悬泉置汉简的驿置道里簿记载的最近距离是54汉里（氏池到麟得），最远者是99汉里（玉门到沙头）。

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 氏池去麟得五十四里

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 麟得去昭武六

十二里 府下

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

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 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

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

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

·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 II T0214①:130A^⑦

至于我们在悬泉置汉简中见到的临泉亭、无穷亭,应该就是正史所言“五里一邮”之邮亭,类似《汉官仪》所谓的“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2]。而悬泉置汉简的“骑置”与《汉书》所谓“因骑置以闻”^⑧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正是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一个机构,悬泉置处在敦煌郡的驿路上,而敦煌郡既是汉朝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也是汉经营西域的大后方,这条驿路也就成为汉代中西交通的大动脉和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悬泉置的设置是为中西交通服务的,其日常运作与维护成为中西交通、中外关系与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悬泉置汉简之中众多接待中西交往人员的资料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中西交通中的民族交往与身份认同

在远离县城的无人区设立一个专门为过往人员提供食宿的机构,是保障交通的需要。作为东西往来人员休息与补充给养的场所,悬泉置的设立显得尤为必要。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悬泉置就是西汉时敦煌的典型代表。悬泉置为往来人员提供必要的服务,经过悬泉置的人们就是中西交通的见证者,他们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他们以汉代的交通路线为依托,在悬泉置住宿、休息,得到保障供给之后继续前行,直至最终完成使命。除汉王朝的使者官员之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中亚、南亚乃至西亚的使团。他们或单独成行

以“奉献”之名去往长安,或者与沿途使团结伴而行,由西域都护府、敦煌太守委派专人护送至长安;而其从长安返回时,多由中央派使者专门护送,其队伍多数以“诸国客”的形式出现。经过对悬泉置汉简的梳理,我们发现,出现在悬泉置的西域使者来自婁羌、且末、小宛、精绝、扞弥、渠勒、于阗、莎车、疏勒等30余国^⑨。其中折垣、祭越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乌弋山离与西夜国^⑩。此外,也有汉朝人到条支国的记录^⑪。

有学者认为汉王朝和于阗、鄯善的交往不宜归入中西交通史的范畴,但是,于阗、鄯善作为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其对中西交通史的贡献不可低估。当时西亚、中亚的使团会和于阗、莎车使者一道去长安,悬泉置对其的接待也是同时进行的,并无二致。对鄯善、于阗使团的接待,也是中西交通接待形式的一种。悬泉置汉简中使团混杂的现象经常出现,如:

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扞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 I T0309③:97
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 至 以食守属董并V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鬲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 至 II T0113②:24

前简出现的使团成员来自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扞弥等,对其的限定词是“客”,这可能是从长安返程时,由某人所送“诸国客”归西域的文字记录。来自不同地域的使者、贵人出现在悬泉置,受到无微不至的接待,被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来自八国的使者竟然有18人,还有贵人若干。后一简记录的是敦煌守属董并、叶贺送莎车、鬲宾、祭越使者经过悬泉置时,悬泉置接待三地使者的消费情况,用160钱沽酒1.6石,供4位使者饮用。而董并、叶贺的供给是单独记录的:

各有数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

I T0309③:134

这是一条反映悬泉置接待过往人员的典型记录,一般学者都会引用。使者王君护送的返程队伍所谓于阗王以下1074人,极有可能就是类似上述二简的另一泛称,作为管理文书没有将1074人的组成详细记录,而重在说明时间与与人

数,让沿途做好接待准备即可,其中“于闐王以下”不是于闐一国客,而是以于闐王为代表的诸国之客。类似的诸国客记录,又如:

传送康居诸国客卫候臣弘副 池阳令臣忠上书一封 黄龙元年

II T0214③:109A

使送乌孙诸国客副使长臣所上书一封

V T1310③:69

·河平四年正月吏为使者丁君所将诸国客治酒

I T0111②:65+T0111①:401^②

校尉丞义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从者一人凡二人一食食三升东

V T1311③:129

以上四简的诸国客都是泛称,除第三简称为“诸国客”外,其他三简都是“某国诸国客”。前三简都是记载从东向西去送行的,送行的使者在途中还给皇帝上书汇报情况;后一简校尉丞应该是戊己校尉的丞,西域都护府派专人护送大月氏诸国客,丞之外还有其从者,此简是其二人在悬泉置的消费记录《粟出入簿》。

出现在悬泉置的多民族人员,除使者外,还有副使者,也有西域的贵人及其仆人或从者,也可以看到“质子”;汉朝方面有西行的使臣、公主,类似长罗侯、乌孙公主等。另外,还有泛称的“诸国客”“胡客”“客”等。参与人员除了敦煌太守府人员之外,还有西域都护的迎送人员,这些是中西交通的保障者。而近汉地的类似鄯善、莎车等,既是中西交通的参与者,也是中西交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保障者。

入麦四石以食送使者萧君所将胡客马十四 鸿嘉四年九月丁酉悬泉置佐谭受敦煌厩嗇夫褒

II T0111①:21^③

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大守守属汉刚送客移过所县置自来焉耆危须鄯善王副使

匹牛牛车七两即日发敦煌檄到豫自办给法所当得都尉以下逢迎客县界相

V T1310③:162

书令县给置一岁过客各具各有品数期毋出十月毕成 已出

I T0309③:53

悬泉置嗇夫博叩头死罪死罪置受司御敦煌北乡南移十月十一月逋十人直线

八千迫大客且到用度不足博叩头死罪死罪唯君哀怜博叩头叩头死罪死罪

II T0111①:224

东送客悬泉置病狂食饮不尽度日益剧马医偃

II T0111③:24^④

对西来人员的称谓从明确精准的使者,到泛称“诸国客”“胡客”,再到更为广泛的“客”,想要从中选择与认定外国客是不容易的。远近客人都是混杂在一起的,而近的客人(非“外国客”)也是当时中西交通的参与者之一。

至于悬泉置的自身运作,为了保障其功能的发挥,其管理制度或文书则将这些人员径称为“客”。前面出现的“一岁过客”“汉刚送客”“东送客”都是当时的泛称。

“客”之外还有一个法律用语“蛮夷”,且有内外蛮夷之分。外蛮夷指汉地之外的蛮夷,内蛮夷是汉地之内的蛮夷,此种分法类似“道”的管理方式,可能源于西汉初年的《蛮夷律》,也就是后世的外事管理制度与条例^⑤。悬泉置汉简中直接出现的“蛮夷”有:

水少至五 六月中禾稼隳焦伤数助县春靡过军传送迎蛮夷客施刑士良家子

II T0114③:492^⑥

·铸伪金钱奴婢犯贼杀伤主适妻以上律皆不得赦在蛮夷中得毋用期赦前有罪后发觉

勿治奏当上勿上诸以赦令免者其死罪令作县官三岁城旦春以上二岁鬼亲白聚一岁

II T0216②:615

申敦煌大守宗长史谭移部都尉谓官 A

兵蛮夷诤伪难知唯府惊当备者敢

B

年 C (残觚)

II T0215②:112ABC

皆坐与蛮夷私下

II T0215S:291

以上四简均出现有“蛮夷”一词,首简的“送迎蛮夷客”与施刑士、良家子并列,其中的“蛮夷客”与前文所谓“胡客”近似,只是称谓不同。第二简明显蕴含地域概念,汉地之外,不归汉人管辖的地域都是蛮夷中,类似今天的国外。其意是指在域外犯罪者,不在赦免之列。类似的还有

一简,文字过于残泐不录。第三简“蛮夷诤伪难知”与第四简“坐与蛮夷私下(交)”,应该是指人,简三在敦煌郡而言可能指羌人、匈奴人,也可能是西域诸国之人。但其作为备用词指代羌、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简四虽有简三的含义,但可能更接近简一“蛮夷客”。如果换作“胡人”与“胡客”,简四则接近“胡人”,而简一则类似“胡客”。

在现已公开发表的悬泉置汉简中,还有二简出现了“蛮夷”,只是因为原释读不察,均有误。分别是:

□库佐同敢言之谨移蛮夷用酒度
I T0112③:103+95A^⑧
……其三人犯法外蛮夷中以诏书□
I T0116②:118B^⑧

前简与悬泉置等准备接待用的酒有关,“度”是事先的估算,“用酒度”就是对能用多少酒进行估算。如果按照已知的《过长罗侯费用簿》记载的事先准备18石酒,悬泉置用效谷县给的3石曲自己酿造,再加上效谷县给的2石,接待长罗侯等共消费酒20石。其中的18石就是按照长罗侯一行的人数所做的用酒度。所言“蛮夷”与前言“胡客”“诸国客”含义接近,可能也会包括部分南羌与匈奴。后一简是对众多犯罪人员的统计簿,众人的犯罪情况并不一样,其中三人犯法在外蛮夷中,类似国外犯罪,以诏书确定是否赦免其罪。“外蛮夷”相较前简属于法律用语,前简则属于日常用语。这是“蛮夷”在二简中出现的具体语境差异。

悬泉置汉简还出现类似今天的“外国”一词,以下是悬泉置的财物支出文书,重在说明物品的支出与使用情况,具体使用者不明。

右出钱四百七十买肉九十四斤 以食
外国王使者贵人从者册四人人再食

II T0215③:26

□以食守属李长所送外国王使者四人人一食一斤

II T0214③:182

出钱九十买肉十八斤 以食使者卜君
所将外国从者九人人再食积十八食一斤

I T0114③:8

□升大以给使外国及所将客斋二事一
千一百七十二石三斗

V T1311④:81

前三简记述的是外国的使者、贵人及其从者,后一简则是“使外国”者及其所将客,属于送外国使者返程的情形。上简反映出在中西交通的往来过程中,西来的使者从长安回程,多由中央派官员(又称“使者”)送他们回西域。

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保障语言交流的“通传”“译人”是不可或缺的,有的学者已经关注到中西交通中的“译人”问题^⑨。悬泉置汉简中出现比较多的译人是“匈奴译”,其次是“羌译”。简文如:

出糜三石八斗四升 己未以食从吏小
史及匈奴译所乘马卅□□ I T0209⑤:16

□其九匹乘 一匹假匈奴□

□廿四匹牡 见马卅二匹□

I T0111②:53+55^⑩

·凡传马卅四匹 其一匹假匈奴

译 □

见卅三匹

II T0213①:8

今余传马卅八匹 其一匹假匈奴译

见卅七匹

II T0216②:220

□卅四匹 其一匹假匈奴译

见卅三匹

II T0216②:695

仓曹言遣守属忠送罢匈奴译诣府

□

II 98DYT1:1142

□ 以食匈奴译及私从者大男二人积

六十人人六升

II 98DYT2:7153

以上七简前五简是悬泉置汉简,后二简出土于小方盘城遗址^⑪。前五简基本上是悬泉置汉简中全部有关“匈奴译”的简,而总数仅有380枚的小方盘汉简也有二简与“匈奴译”相关。这是偶然现象,还是有别的原因?是边塞屯戍需要匈奴译侦察与了解敌情,还是与匈奴人交流的需要?

针对更远地区的中西交通,除了一简出现“羌胡译”的泛称外,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发现。此简是:

入粟八斗 阳朔二年闰月甲辰悬泉吾

子文受遮要嗇夫博以食羌胡译行书马辄赐
之等传马

II T0215②:16

如此一来,史书中出现的“导译”或“译人”,在悬泉置汉简中除了“匈奴译”之外,还需要其他什么语言作为交流语言呢?马圈湾汉简莫府档案的“虏译”也是一条不太明晰的资料:

都护虜译持檄告戊部尉欽，车师前附城诘 马·112177^②

悬泉置汉简中的羌译，时间比较早，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天水郡以“请诏”的形式给敦煌郡调派羌译一人，“妾南”是羌人名字的汉字显示。文书是天水郡戎邑签发的传文书，妾南经过悬泉置时，悬泉置对其传文书的录文如下：

元凤五年十一月丙子朔辛卯尉史宣敢言之戎邑给敦煌郡羌译一人有请诏今谨遣

羌译板里男子妾南以县牛车传送续食谒移过所县道官给法所当得舍传舍敢言之 A

十一月辛卯戎邑丞舍移过所县道官河津关往来复传如律令掾留见守

令史建德□□元凤五年九月丙申过东 B VT1511^⑤:2AB

敦煌郡亟须羌译向昭帝请示，这可能是敦煌郡建立之后，与南山羌联系交往的需要。最后，中央将敦煌郡获得批准的诏书转发给天水郡，由天水郡调配羌译妾南去敦煌。天水郡依据的则是“请诏”。

综上，悬泉置汉简中出现了各类人员的称谓，有客、诸国客、胡客、外国客，有王、王使者、副使者、贵人、从者，还有“蛮夷”，有归义的大月氏、羌等。然而其中对于作为中西交往桥梁的翻译人员的反映并不多，虽然学者关注了其中的“译者”“译人”，但总体上数量较少。

三、制度运作与负担压力：悬泉置的日常运作

西汉时期是政府主持参与中西交通的开始，机构的设置、运营与日常供给都是政府行为。为了招徕西域诸国，朝廷派众多使团携带大量丝绸、珠宝西行，而西域诸国亦感受到汉朝的强大与富裕。然而关于双方的交往对汉朝的作用，在当时就有不同的看法。除史书的简单记录之外，要探讨西汉之时中西交通的状况，悬泉置的日常运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从悬泉置的机构规模、人员配备、马匹管理、传舍标准、日常生活物资的供给到具体的每一次接待活动，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西交通的后勤保

障、日常服务以及具体的交往形式与过程。在已有对悬泉置汉简的研究中，有很多比较典型的资料。总而言之，体现中西交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康居使者的接待

在这些资料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案验康居王使者献驼册》，围绕康居王使者奉献骆驼出现的外事纠纷所体现出来的中西交通、交流与交往，多数学者已有探讨^③，不再赘述。下面是另一条关于康居使者的简文：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捷

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

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戍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

II T0213^③:6+ II T0214^③:83 A

这条简文早年笔者只是注意到其后半段，其中的“比胥捷”三字使人联想到西域的北胥捷屯田。史书中有“北胥捷”，一直没有出现对应的“南胥捷”。本条简文的出现解决了西域屯田的名称问题，不是“北胥捷”而是“比胥捷”^④。

该简出土时残断为两段，后期将两段缀合。现有的简文是三行文字，是敦煌郡太守发给酒泉郡的文书，介绍康居王的使团状况，让酒泉郡做好接待工作。在使团途经悬泉置时，悬泉置将这份文件进行了抄录，作为其接待过往人员的凭证。

本简的时间是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正月，是敦煌太守千秋与兼行丞事的库令贺联名给酒泉郡太守府的文书。大意是安远侯郑吉派其手下“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皇帝，顺便护送康居国的一个使团到长安。甘露二年的安远侯，即“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郑吉，西方来的康居国使团首先在西域得到西域都护府的接待，遇到罢归回长安的候丞赵千秋给皇帝送安远侯郑吉的上书，顺便沿途护送康居的使团去长安。因为时间是正月，恰与走“沙道”入玉门关的黄金时段相吻合。敦煌太守给酒泉太守府的文书中，也提到使团入玉门关时的查验工作

已经完成,使团的组成、携带物品的数量,等等。

康居国的使团组成有使者2人、贵人10人、从者64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皇帝奉献2匹马、10头骆驼。自己使用的马9匹、驴31匹、骆驼25头,还有1头牛。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沿途提供给养的,如草与饲料等,至于通常所说的西域珠宝异物在文书中并没有显示。

使团即使是有西域都护的人专门护送,入玉门关时的查验手续也是不能省略的,“阅名籍畜财财物”就是基本的查验程序。戊申日入关,第三天又由敦煌太守签发文书,可见其速度很快,因为从玉门关到敦煌中间需要两天时间的行程。入玉门关之后,第二天才有可能到敦煌。

悬泉置汉简中没有出现敦煌太守府签发的康居使团的传文书,这也与西域都护府签发传文书的情况相吻合。西来使团的通行证也就是悬泉置汉简常见的“传文书”,既有西域都护府签发的,也有敦煌太守府签发的。敦煌太守千秋给酒泉太守发文,依据的就是西域都护府签发的传文书。这个使团在敦煌郡从敦煌到渊泉,有敦煌太守府给酒泉太守府的文书就可以证明其身份。

至于悬泉置接待这个使团的花销是多少,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从这条简文只能看到使团的管理,从西域入玉门关到敦煌,再从敦煌东行的局部信息。其所反映的情况是中西交通某一时段具体人员的构成与管理程序。这是西来人员的状况。

(二)从长安去西域的使团管理

使者在长安完成奉献任务后,得到皇帝的赏赐,返程时我们看不到他们所携带的丝绸之类的物品的记载,悬泉置汉简中出现的是送西来使者回去的传文书,一般是由长安直接派专使护送;传文书之外,还有接待这些人的消费记录。比较特殊的是类似于闾王等一行回去的事先通报,其产生的原因是需要接待的人员众多,不事先通知难以完成接待任务。

西来使者返程,一般是朝廷派专使护送回西域,使者不是一国一地而是集中护送。悬泉置汉简中类似的传文书记录有:

永光二年六月乙亥左将军卫尉臣嘉右将军□掾属臣奉世承

制诏御史曰使送焉耆王北道客传马□

□□□□□文□

檄蔡宗辅俱

为驾一封轺传二人共载

龟兹焉耆王使者三人贵廿四人,

献驴十四橐佗五匹遣马三匹 正月癸

卯东□

VT1210③:131

“共载”以前文字是传文书,而其下第二栏并不是传文书用语。第一栏持传人的任务是“送焉耆王北道客”,除焉耆王之外,还有西域其他小国的使者。第二栏不是传文书,而是记录了西域小国龟兹、焉耆的使者团队状况,且时间是正月癸卯,而与传文书第一栏出现的六月时间相差半年之久。第一栏是送焉耆等国使者回去,第二栏是龟兹、焉耆又派使者给皇上奉献驴与骆驼,顺便由送行的使者回程时监护带到长安。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皇上派人送西域小国的使者回去之后,小国又派使者来长安表示感谢。

与专使的传文书录文同时,还应该由使者一行经过悬泉置的花费记录,或称“簿”“出入簿”等。如:

□君张君王君送乌孙诸国客过置食费

直

II T0114④:41

出芟八十七石 以食译马百一十六匹

送迎诸国客使者积六百九十六食食十五

斤

I T0111②:35

与悬泉置日常接待使团记录不一样的是简

I T0309③:134,此简记录的西归使团过于庞大,需要提前进行通报,预先准备。简文称:

各有数今使者王君将于闾王以下千七

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

本简原本是酒泉郡给敦煌郡的通报文书,使者王君护送的使团有1074人,预计五月丙戌这一天从酒泉郡治所禄福出发,5天之后会到敦煌郡最东的驿站渊泉。这个文书在悬泉置出现应该是敦煌郡又将这一情况下传给悬泉置,让悬泉置知道有此事,接待的规模庞大,人员众多,预先做好接待准备。因为是散简,具体如何接待不详。如果联系到送楼兰王东行的记录,大概是敦煌郡要将接待需要的人、马、车调往渊泉,以“柱”的形式等着接待。简文所言是“柱敦煌”

的安排:

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
当柱敦□ II T0115②:47

悬泉置接到类似通知之后,人员数量庞大,如何接待?常用的人手、物品一定是不足的,需要置备不同数量的用物:房舍、酒肉、粮草,调动附近可以来悬泉置帮忙的人手等。接待楼兰王的“柱敦(煌)”与使者王君即将到来的通知,都可以看作汉代邮驿系统接待人员的事先准备步骤,而《过长罗侯费用簿》所记内容已经是事后记录^⑤。事中阶段如何进行尚不清楚。不仅悬泉置自身会面临各种与接待有关的事务,而且置与置之间还会因为参与接待的人员调配,产生粮草、物品相互借用的情况。如: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
鱼离悬泉遮要龙勒厩嗇夫昌持传马送公主
以下过禀

糠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十
一月报毋令缪如律令 II T0114③:522
本简是渊泉置告知广至、鱼离、悬泉、遮要、龙勒等置人员在渊泉消费了多少饲料糠麦,要计入十一月的往来账目中,以备彼此之间将来办理交付事宜。

(三) 过往人员接待给悬泉置带来的负担

作为中西交通最西端的行政主管,西域都护郭舜这样论述当时汉与康居交往的情况:

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3]

悬泉置只是敦煌郡下辖驿站的一个典型代表,不仅负责内部往来人员的接待与政令文书的传递,还要肩负为中西交通服务的重任。在中西交通繁忙之时,悬泉置自身的接待窘境,也体现出中西交通给沿途带来的负担。简文记: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长史熹丞破胡谓县律曰诸乘置其传不名急及乘传者驛驾皆令葆马三日三日中死负之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传马员三百六十匹计以来死者三百六十八匹过员八匹令长丞不忧亲严教主者吏马饮食不得度病不以时医治马死者以故众多甚毋状悬泉置尤剧已论丞嗇夫书到案赦以来当负马者趣责

马齿五岁以上至十二岁高五尺八寸以上丰厚任用者守丞行县见所偿马如律令

II T0115③:80+81+82

三简文字属于一册书(80+81+82),其中提到甘露二年敦煌郡太守发文,要求郡中的驿站做好马匹使用与管理工作。类似悬泉置的9个驿站马匹定员360匹,但在一年之中竟然死掉368匹。这些马匹都是郡府调拨的,马匹死亡之后,还需要补充才能满足日常迎来送往的需要。

马匹只不过是中西交通的常备用品之一,还有养马的人、马匹食用的草料、马医,等等。即便是在马匹配备基本合理的情况下,繁忙的接待事务也时常让骑置捉襟见肘,马匹得不到相应的休息,使用过度。如:

余见马三匹送迎客檄书多马少用刷罢
传车器物传相腾 II T0111②:62

护羌使者方行部有以马为谴长必坐论
过广至传马见四匹皆瘦问厩吏言十五匹送
使者大守用十四 II T0215③:83

前简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置的情况,定员40匹马,在某一天检查时仅看到3匹,而迎送客人、传递檄书的任务又重,“马少用刷罢”。传车与其他器物也是应急混用的。后一简明言广至置的状况,置中仅剩4匹马,15匹送使者使用,10匹归太守使用。

这是马匹使用出现的一些短缺状况,而悬泉置接待人手不足的情况,也在其文书中时有记录。如:

不可以过客韭尽酒肉度少唯廷为调肥
牛肉肥半瘦 I T0112③:88

悬泉置嗇夫博叩头死罪死罪置受□□
敦煌北乡南移十月十一月遣十人直线

八千迫大客且到用度不足博叩头死罪
死罪唯君哀怜博叩头叩头死罪死罪

II T0111①:224

迫客且到人力少不足恐客到不□

V T1510②:130

以上记录的是不同时期悬泉置人手与物品短缺状况,置嗇夫博“唯君哀怜”的狼狈处境。第一简说物品少,“不可以过客”,无法接待客人的原因是“韭尽”“酒肉度(预计)少”^⑥,希望效谷县调给好的牛肉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简说敦煌逾欠

悬泉置人手10人,折合8000钱,又迫于重要客人将路过悬泉置,“大客”来与简三类似,接待客人需要的人手不足。

过往的客人众多,悬泉置就需要准备超量的酒、肉与粮草,而接待过程中需要使用的人手常常有不到岗“逋”的情况。虽然悬泉置可以让效谷县解决,但这种状况对效谷县乃至敦煌郡而言无疑都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也可以看作郭舜所言“苦”的表象之一。

结 语

悬泉置汉简以其出土于关键地点的独特性和档案文书的细节性,深化了学界对汉代中西交通史的认识。其价值体现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首先,它确立了悬泉置作为丝绸之路东段核心枢纽的地理坐标,并清晰勾勒出以之为中心的层级化邮驿网络,揭示了汉代交通动脉的制度根基。其次,它生动再现了汇聚于此的多元人群及其互动场景,展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图景与宏阔的历史画卷。最后,其自身运作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西交通日常实践与制度保障的微观窗口,同时也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揭示了这种繁荣对边郡造成的经济负担与压力。

悬泉置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一个机构,是研究中外关系、中西交通以及丝绸之路在西汉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位置的确定为当时的交通路线提供了明确的地理坐标。悬泉置的日常运作与管理,是汉代中西交通史的缩影,为中西交往的人员提供了文化展示、交流的场所。悬泉置汉简是记录汉代中西交通的档案文书,是对史书记载中西交通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补充与完善。通过对众多简牍文书的梳理,我们发现在悬泉置汉简中,中西交通的表现主要是往来人员的接待与管理,而经过的使者及其使团携带的物品如珠宝、金银、丝绸、绢帛等并没有记录。也许是悬泉置并没有检查、验核的权限,其主要是为经过人员提供所需的车、马、饮食、住宿等服务,以至于中西交通中的丝绸、绢帛等西去物品在简牍中均没有出现。

事实上,在中西交通的大路上行走的使者及其团队,有时是难以区分远近地域的,甚至是

混合的使团,集中护送更方便管理与提供服务,特别是使者从长安西归都是由专人一并护送,其中的人员组成并不具体。西域都护与西域小国,既是中西交通的参与者,又是中西交通安全、生活的保障者。频繁的接待任务给沿途的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西域都护郭舜所言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皆苦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具体状况的真实体现,这也可以通过悬泉置汉简所记的悬泉置接待窘境间接地体现出来。人手、物品、马匹短缺,而路过悬泉置的客人众多,需要在悬泉置吃、住,悬泉置嗇夫迫不得已祈求效谷县哀怜一二,考虑其困境并提供急需的帮助。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悬泉置汉简中保留下来的部分,其体现出来的接待情况与接待负担也只是局部,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某一事件的细节末端。如果将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的《食鸡簿》、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的《过长罗侯费用簿》与悬泉置本应该存在的简牍文书对比,我们会发现《食鸡簿》只是数十年中一年的记录,类似的文书原则上应该每年都有;每次大型接待都应该有类似《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决算文书,而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之一。类似的接待如“日逐王降汉”、乌孙大昆弥奉献、康居国与大月氏使团都应该有一个类似的“过……费用簿”。我们可以从极其宝贵而又有很大局限性的悬泉置汉简管中窥豹。

注释

- ①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悬泉汉简(壹一伍)》,中西书局2019年版、2020年版、2023年版、2024年版、2025年版。
- ②遗址发掘时瓜州县尚称安西县,2006年更名“瓜州”。
- ③吴炳骞:《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92、112页。
- ④张经久、张俊民:《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张俊民:《悬泉汉简与丝绸之路三题》,载樊锦诗、杨富学编:《敦煌与中外关系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年版,第398—423页。
- ⑤买梦潇:《〈悬泉汉简(贰)〉简I 91DX0409 ④A:1短札》,简帛网2022年5月16日,<http://www.bsm.org.cn/?sglj/8700.html>。
- ⑥《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有悬泉水、悬泉驿,驿在水东15里。参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5页。
- ⑦此类简号释文均出自《悬泉汉简》,

超出部分录自2003年释文定稿。按简号可以在书中找到文字,具体页码从略。下同。⑧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12页。⑨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47页。⑩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罗帅考证“折垣”是乌弋山离,而“乌弋山离”又见悬泉置汉简ⅡT0115②:95“遮要第一传车为乌弋山离使者□”。⑪张俊民:《悬泉置汉简 I T0116②:118 释文与校读》,《出土文献研究》第20辑,中西书局2022年版,第359—371页。⑫谢明宏:《〈悬泉汉简(貳)〉缀合(十六)》,简帛网2021年12月12日, <http://www.bsm.org.cn/?hanjian/8533.html>。⑬本简的文字书写很不标准,“四石”作“𠄎石”,“石”字右下不是“口”而是“土”字;“者”字《悬泉汉简(貳)》原释作“客”字不妥,今改释。⑭“东送”二字《悬泉汉简(貳)》未释读,今据图版补。⑮唐俊峰:《新见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外乐律〉〈蛮夷律〉条文读记与校释》,《法律史译评》第8卷,中西书局2021年版,第72—93页。⑯“蛮”字原书释作“𧈧”字,“蛮”字变体,今改释。⑰“蛮夷”,已有释读《悬泉汉简(壹)》作“变第”,今改释。⑱“蛮夷”,已有释读《悬泉汉简(壹)》作“给事”,今改释。参见张俊民:《悬泉置汉简 I T0116②:118 释文与校读》。

⑲王子今、乔松林:《“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西域研究》2013年第1期。⑳“匈”字,已有释读《悬泉汉简(壹)》作“官”,今改释。㉑张德芳、石明秀:《玉门关汉简》,中西书局2019年版。㉒张俊民:《马圈湾汉简整理与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177页。㉓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辨》,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149—161页;郝树声:《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㉔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㉕张俊民:《元康五年过长罗侯费用簿》,《陇右文博》2000年第2期。㉖悬泉置汉简 V T1309④:25所言不知是何处,一次接待的“使者贵人百八十九人,用肉千八百七十二斤”,而缺口竟然是“凡少千二百七十三斤”。

参考文献

- [1]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二年律令与奏谏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孙星衍,等.汉官六种[M].周天游,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153.
-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3893.

A Study of Historical Facts on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as Recorded in the Xuanquanzhi Han Slips

Zhang Junmin

Abstract: The Xuanquanzhi is the only relay station site along the Silk Road that has been archaeologically excavated and yielded a vast quantity of written records. Its daily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reflect the flourishing east-west communication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offering a model of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 Xuanquanzhi Han Slips, distinguished by their unique provenance at a strategic node and exceptionally detailed archival documentation, have significantly advanced scholarly understanding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history in the Han Dynasty. Their value manifests in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first, the slips precisely situate the Xuanquanzhi as a key hub on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 mapping a hierarchical postal network that radiated from it and revealing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he Han dynasty's transport arteries. Second, they vividly reconstruct the diverse populations that converged at this node and their interactive dynamics, showcasing the complex social fabric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Finally, the posthouse's operational archives provide a microscopic view of the daily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hat sustained east-west transportation, while also reflecting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the frontier prefectur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Xuanquanzhi Han Slips;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the Silk Road; ethnic interactions; postal relay system

[责任编辑/启 轩]